

翻译学研究路径之演变与反思

孙爱娜 曹佩升

摘要：随着翻译学研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译学研究路径层出不穷、交相辉映。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扩大研究视野、发掘译学研究的新路径、促进翻译学理论的系统化，是译学研究者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和使命。在回顾译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各种研究路径对译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探讨了当代译学研究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转向，进而就深化译学研究、加强译学学科建设、促进译学与相关学科研究范式的整合等议题进行了反思性分析，最终指出了译学研究未来的新路径和新突破。这对研究者把握翻译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厘清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探求译学研究的新领地，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翻译学；研究路径；跨学科；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H315.9

DOI: 10.12002/j.bisu.2016.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6) 01-0072-09

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在国内外的迅速发展，“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于20世纪80年代成功建立起来”（Bassnett & Lefevere, 1990: ix），有了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以及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或路径。从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学研究路径、语言学研究路径到20世纪60年代的哲学研究路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文化研究路径到20世纪90年代的认知学研究路径等，“翻译研究积极地吸取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了自身的研究武器和手段”（廖七一，2006: 6）。翻译学研究的水平和前景主要取决于其科学研究方法（曹佩升、刘绍龙，2011: 90）。因此，在评价译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回顾和总结译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路径及其对译学发展的影响，并就译学研究发展的跨学科转向进行探讨，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从方法论的高度发现未来译学研究的新领地、新路径，而且对译学和语言学、文学，乃至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研究范式的整合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3年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课题“翻译学研究方法体系建构”（粤财教[2013]412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翻译学研究的主要路径述评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翻译学研究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流派,研究范式或路径经历了多重“转向”。代表性的研究路径有文艺学研究路径、语言学研究路径、哲学研究路径、文化研究路径和认知学研究路径,它们都为推动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运用文艺学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处理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就是翻译学研究的文艺学途径(杨才铭,2008:28)。翻译的文艺学研究历史悠久,在翻译研究开始之初便被提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文艺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翻译美学理论的建立,翻译诗学理念、接受美学观点和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提出等。以加切奇拉泽为典型代表人物的文艺翻译学派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创作或再创作活动;翻译应尊重入语文化和译文受众,并力求等效;翻译要注重风格和美学功能。文艺学翻译研究理论明确了翻译创造性的合理性,重视读者的感受和译语的效果。同时,文艺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研究者们往往不够重视甚至是忽视“先有原文、后有译文”这一客观规律,过分强调译者甚至译文读者的主体性地位,偏重翻译的创作性,以致模糊了原文作者的主体性地位。

伴随着文艺翻译学派的兴起和发展,语言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也进入其迅猛发展时期:从雅各布逊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分类,到奈达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翻译原则和“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翻译过程四步模式,再到哈蒂姆、梅森、豪斯、斯奈尔·霍恩比、莫娜·贝克等新一代具有语言学背景的翻译理论家将非语言因素纳入研究视野,创建了关于翻译的描写、评估或教学模式。这些研究奠定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的理论层面,被称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该路径的前期研究者曾将翻译的中心问题局限于“在译语中寻找等值物”,把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局限在“描述翻译等值的本质和达到翻译等值的条件”上。然而,随着当代语言学派各分支的深入发展,西方翻译学界中新一代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者已经在现代语言学框架下将文化等更多非语言因素纳入自身的研究视野,为翻译学学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多种翻译学研究路径的开拓和演进,尤其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哲学与翻译的关系更加紧密,许多西方哲学流派都把语言的理解、解释和翻译作为关注的焦点。“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德里达、奎

因等纷纷从哲学角度论述翻译或者从语言、翻译角度探讨哲学”（刘军平，2010：64）。解构主义被引入译学，促成了翻译研究的哲学转向。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是一种改写、增补和扬弃；翻译的意义超越了地缘和民族的疆界，文本只有置身于具体的语境才有意义。解构主义翻译观摧毁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堡垒，解构了二元对立言说，打破了原文本质中心论、模仿论、原文决定译文论，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然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过分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读者的个人意志，否定恒定的结构，从而导致了阐释的多元论，使翻译最终陷入虚无混乱。

语言哲学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译学研究的疆域，并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营养储备。20世纪7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在翻译领域一路升温，翻译研究的范式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从事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如伊文·左哈、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维尔、劳伦斯·韦努蒂等，开始从文学研究的视角切入翻译，将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从而形成了翻译的文化研究路径。1990年，Bassnett & Lefevere 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0）一书，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致力于对翻译与社会权力关系的探讨，并意图揭示翻译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使得翻译研究“从翻译作为文本走向翻译作为文化与政治”（Munday, 2001: 127），对于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文化学派的翻译观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如它全盘否定传统的语言学派，认为其之前的翻译研究一直停留在“对等与否”的文字层面，同时过分强调翻译的“文化功能”，将研究重点放在制约翻译的各种文化因素上，却又未能对这些因素做出明确的界定。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研究成果的日渐丰富和研究疆域的不断扩充，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间的互动交流愈加频繁，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被引入翻译学界，用于重新思考和审视各种翻译现象。1991年，Gutt 撰写的《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Relevance and Translation: Cognition and Context*）问世，认知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正式拉开帷幕。认知翻译研究者指出，翻译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信息加工模式、加工策略、加工单位，以及译者的翻译能力与习得、翻译专长与认知努力等是研究的重心。虽然认知翻译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范式阶段（Martin, 2010: 169-187），但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Danks *et al.* 的《口笔译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7）代表了该路径研究的一大进步，Shreve & Angelone 的《翻译与认知》（*Translation & Cognition*, 2010）和 O'Brien 的《翻译的认知阐释》

(*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 2011)体现了翻译认知研究的最新成果。可见,翻译的认知学研究路径利用现代认知心理测试工具去重新审视和验证翻译过程,实现了翻译学与其他学科间的亲密合作,促使翻译研究走上了科学实证之路和跨学科研究之路。

总之,在翻译学研究领域,任何一种研究路径或理论流派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都从不同的侧面,或本着不同的侧重点对翻译本质、翻译技巧,或同一翻译问题进行描述与探讨。每一种新的翻译研究路径的产生都代表了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研究特征和研究取向,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立场和切入点,从而为翻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视角。不同的翻译研究路径之间并非颠覆与被颠覆、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互动、互为补充、相互丰富、演进发展的关系。

二、翻译学研究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转向

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翻译学术界所呈现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特点时,Hornby(2006: 115)首创性地提出,翻译研究在90年代主要发生了两大转向——实证转向和全球化转向。与重视文本的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翻译研究的实证转向要求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和方法时转向对译者本身的心理表现、翻译的过程进行更多的跨学科实证性对比分析和研究,从而摒弃以往依赖个人观点直感式或推测性的方式进行论述的传统研究方法(曹佩升、费伟,2012: 119)。而在翻译研究的全球化转向过程中,当代译学实现了三大根本性突破:研究重心从技能层面的语言转换转移到深层次翻译行为本身,研究对象从翻译的文本延伸至译事活动的发起者、译者和目标受众,研究维度从翻译行为本身的考量拓展到对所处宏观文化语境的审视。这些突破性进展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翻译学的研究路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重心的转移演进,更从根本上反映了翻译学研究的领域、思路、视角和层次得以拓展提升。如今国际翻译学界的研究者正对翻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做出积极探讨:从语言层次的微观分析到历史、文化、社会的宏观论证,从哲学、语义学、语用学、文学、信息论的探讨到文化学、社会学、符号学、传播学乃至大众传媒和机器翻译等的引入(廖七一,2006: 6)。关于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李红满(2014: 26)通过CiteSpace软件对2008—2012年基于SSCI权威翻译学期刊所提取的突变术语及其频次进行统计分析,指出突变值较高的翻译研究术语“主要集中和体现在对翻译与社会以及翻译与技术的两大维度之上”。不难看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翻译与社会、

翻译与技术的日益密切结合已成为当前国际译学研究的主流和新趋向。

值得一提的是，认知路径的翻译学研究在短短的 20 年中成果斐然，它所采用的认知-心理研究视角从纵深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其认知模块研究中眼动跟踪技术（Eye-tracking）、脑电图仪（EEG）、磁共振成像（fMRI）、事件相关定位（ERPs）等多种现代心理测试工具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翻译与技术的有效结合，促成了翻译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协作，使得翻译研究从内省思辨走向了科学实证。认知路径的翻译学研究使得研究的重心从对产品-功能导向的思辨式研究转到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心理的实证研究上来。不可否认，译者心理研究与心理语言学、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和模型之间存在或潜在着极强的关联性，译者心理研究者与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专家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曹佩升、费伟，2012：119）。

此外，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空间，翻译与社会问题一度成为译学研究的热点。2010 年，莫娜·贝克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的重要读本》（*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收集了《民族自治与普遍权力：全球视野下正义之阐释》、《文学资本的积累与圣化：作为失衡交换的翻译》、《翻译社会学探索：作为文化系统的文本翻译》、《战争中的翻译》以及《战争、翻译、翻译主义：战地译者》等多篇来自社会学研究者的论文（Baker，2010）。2012 年，《笔译与口译研究》（*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推出了一期相同主题的特辑，即“笔译与口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译者的身份角色与翻译行为的社会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在翻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空前勃兴的今天，译界学者更应摒弃“唯某一种研究路径是用”的观点，本着开放、兼容的心态和国际化视野来探讨翻译学研究，探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转向，势必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方能成就翻译研究路径的复杂化和多样性，并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三、译学跨学科研究转向的反思及译学研究的新路径

随着翻译学研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扩大研究视野、深化学科内涵、促进翻译学理论的系统化、发掘译学研究的新路径，是译学研究者在新时期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为此，译学研究者须把握学科的

整体发展脉络,厘清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此基础上推动译学研究的跨学科综合转向。

1. 译学研究亟须方法论

“翻译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地位,是随着翻译研究对象、目的、方法和研究领域逐渐明确,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和方法论意识日渐增强而获得的”(穆雷,2010:12)。方法论意识缺乏,是导致批判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翻译研究领域,学者并未给予方法论应有的重视,这主要因为方法论并不能对翻译实践发挥直接指导作用,而且与其他学科相比,翻译学研究起步较晚,其理论体系建构还不成熟,针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远远不足。然而作为学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法论能够丰富研究者的研究手段,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更加合理、有效,使翻译学研究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翻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是衡量翻译学研究整体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没有相当程度地翻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提高翻译学研究水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曹佩升、刘绍龙,2011:90-96)。因此翻译学研究者须加强方法论意识,提高自身的批判思维能力和学术判断能力。

2. 译学研究期待与其他学科间的有效互动

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现实的重大问题,更要在立足翻译的基础上积极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学科交汇融合。然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发展译学研究,并不意味着机械地挪用其他学科的基本命题去发展翻译理论,或通过翻译案例去佐证相关学科/理论在翻译学中的普适性,而是应该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对翻译学本体知识的增加做出贡献,同时反哺其他学科的研究和实践、发挥译学的社会功能(蓝红军,2015:19)。“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才刚刚初步完成了体制建设,还远未达到成熟,也尚未与其他学科形成有效地互动并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开展翻译研究”(穆雷,2012:11)。要取得更大的进步与发展,要想不断获得新的学术增长点,翻译学研究应该也需要与其他学科实现更大范围的交叉和更高层次的融合(O'Brien,2011:12)。

3. 译学研究渴望更加开放、兼容的姿态

虽然目前“翻译学领域的高影响力作者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及奥地利等欧洲国家”,“近五年来,丹麦、西班牙、以色列、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翻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渐提升”(李红满,2014:26)。低地国家、北欧、加拿大和以色列的翻译理论家也纷纷崛起,俄罗斯、东欧的翻译研究百家争鸣,南美和南非的翻译思想和观点令人瞩目,亚洲的翻译学者正以自己独

特的视角参与世界译论交流。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翻译研究成果应本着更加平等、开放、兼容的姿态,营造不同思潮、不同见解、不同路径间相互碰撞、交融、互补的氛围。翻译学研究“需要关注和研究世界各国的翻译话语和翻译传统,才能面对和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开拓出翻译研究的新范式、新模式和新视野”(Tymoczko, 2009: 401-421),助推翻译学研究的跨学科综合转向。

4. 译学研究呼唤更多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

在译学研究发展的初期,引进、译介较为成熟的翻译思想或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传播学术研究成果,促进翻译理论的建构。从翻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来看,研究者更需要对引进、拿来的东西加以扬弃,因为批判意识的长期缺乏会带来学术上一味的跟风和盲从。目前中国译学的发展还不平衡,“无论是中国传统译论还是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往往满足于诠释和跟踪,因袭多而创新少,证实多而证伪少;守护多而诘问和质疑少”(廖七一, 2006: 7)。因此译学研究者应当把学习、引进的翻译研究成果加以改造创新,赋予自己的特色、为我所用,形成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本土翻译流派或学派,方能更好地参与国际译学交流,真正融入译学研究的跨学科综合转向。

总之,在翻译学研究领域,每一种新研究路径的产生都代表了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反映了不同的研究特征和研究取向。随着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技术的日益密切结合,未来译学研究的路径必将实现更多新的突破。

首先,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极大地开拓了翻译学的阐释空间和话语体系,“翻译的社会属性和译者的身份认同”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来势汹汹。其次,翻译产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无法回避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争斗,“翻译与冲突”、“翻译与伦理”成为国际译学领域重要的新兴议题,行动主义取向的翻译研究同样势不可当。再次,神经科学的新成果、新启发为翻译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认知路径的翻译学研究将会如火如荼,带来更多喜人的进展。最后,信息时代翻译与技术的密切结合赋予翻译研究以数字化多模态的特征,口笔译语料库的建设研究前景广阔,技术(机器)路径的翻译研究势头强劲,未来必将占据更多、更高的领地。

结语

“译学与语言学和文学一样,已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专门化的学问,需要系统的研究与学习”(廖七一, 2006: 7)。正因为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翻译学

不可能孤立发展,它需要多元的研究理论、研究路径和研究视角,必须从其他学科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资源和支持,并力求为其他相关学科带去思考与突破。

“当前整个国际译学界的一个发展趋势,即冲破固有的学科框架,大量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全方位、多视角地理解翻译、描述翻译、剖析翻译,从而使得翻译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最具吸引力、最富学术研究前景的学科之一”(谢天振,2008:9)。翻译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兴未艾,不同研究路径和研究成果间的竞争与互补不可或缺。译学研究者需要不断增强方法论意识,积极促成翻译学与其他学科间的互动交流,以更加开放、兼容的姿态关注翻译活动的新动态、新趋向,本着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不断发掘国际译学研究的新领地、新路径,为进一步加强译学研究和翻译学学科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usan & Lefevere And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 1990: ix.
- [2] Danks, J., G. Shreve, S. Fountain & M. Mcbeath (Eds.).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 Thousand Oaks, C. A.: Sage, 1997.
- [3] Gutt, E. *Relevance and Translation: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4] Lambert, Sylvie, and Barbara Moser-Mercer.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69.
- [5] Martin, R. M.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 In G. Shreve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169-187.
- [6] Snell-Hornby, Ma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6: 115.
- [7] Baker, Mona. Reframing conflict in translation [A]. In Mona Baker (Eds.).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53.
- [8]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127.
- [9] O'Brien, S. *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 Eyes, Keys and Taps* [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12.
- [10] Shreve, G. & E. Angelone. Cognitive effort, syntactic disruption, and visual

- interference in a single translation task [A]. In G. Shreve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 Cogni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247.
- [11] Tymoczko, Maria. Why translators should want to internationalize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009 (2): 401-421.
- [12] 巴尔胡达罗夫. 语言与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25.
- [13] 曹佩升, 刘绍龙. 翻译学实证研究方法体系建构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1 (1):
90.
- [14] 曹佩升, 费伟. 译者心理实证研究路径分析 [J]. 外国语文, 2012 (6): 119-124.
- [15] 曹佩升, 刘绍龙. 描写翻译研究方法论 [J]. 中国外语, 2011 (1): 90-96.
- [16] 李红满. 国际翻译学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J]. 中国翻译, 2014 (2):
26.
- [17] 蓝红军. 译学理论何为——对我国翻译学理论研究的思考 [J]. 上海翻译, 2015 (1):
19.
- [18] 廖七一. 翻译研究的趋势和中国译学的现代化 [J]. 中国外语, 2006 (2): 6-7.
- [19] 刘军平. 通过翻译而思: 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 (2):
64.
- [20] 穆雷. 翻译学的学科身份: 现状与建设 [J]. 上海翻译, 2010 (4): 12-13.
- [21] 穆雷. 也论翻译研究之用 [J]. 中国翻译, 2012 (2): 11.
- [22] 谢天振. 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 [J]. 中国翻译, 2008 (5): 9-10.
- [23] 杨才铭. 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路径 [J]. 民族翻译, 2008 (1): 28.

收稿日期: 2015-10-26

作者信息: 孙爱娜,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大学英语教学中心, 510970,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电子邮箱: 1195484353@qq.com

曹佩升, 广东警官学院公共课教研部, 510230,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